

7月25日那天近午時分，編者正忙於本期出版工作，獲悉與本刊長期並肩合作的「世紀中國」網站將被關閉。剎那間，天空的雷聲與心中的悲歌齊聲共鳴，痛惜萬分。六年前，我們與內地的朋友一起開設「世紀中國」學術文化網站，是出於共同的目標，即本刊扉頁上的那幾個大字：「為了中國的文化建設」。就在「世紀中國」剛剛過完六周歲生日時，卻被勒令關閉。網站拒絕自殺，顯示出生死之際的尊嚴。網友們不忍離去，從五湖四海匯聚在這個虛擬廣場，為他們視為精神家園的網站守夜、送行，見證「世紀中國」成為歷史的一刻。「世紀中國」在中國當代公共領域、在網絡文化建設史上，留下不會被人遺忘的一頁。

本刊4月號「論『施米特熱』在中國」的專輯出版後，學界反應十分熱烈。李國維在台灣《思想》雜誌第二期發表專文評論；遠在美國的李澤厚先生來信說：「非常高興地讀了剛收到貴刊總94期刊載的評論施米特的文章，說出了我一直想說而沒有能力（因缺乏足夠研究）說的話。徐賁、季衛東諸文均直指要害，痛快得很。特寫此信，聊表敬意。」

——編者

互聯網的媒介圖像

馮廣超以〈長城在我家門前〉（《二十一世紀》2006年6月號）為喻，非常細緻地梳理了中國大陸的互聯網控制現狀及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對香港媒體的影響，讀來感覺身邊的媒介圖像明晰了許多，因為這就是生活其中、「觸手可及」的日常媒介生態。但是，在描述一番這樣的「全能主義」控制情景的同時，實在是須要在互聯網對社會的單向推動考量之外，細想一下大陸社會的基本控制結構。

互聯網對於中國大陸的控制結構來說，它根植於社會基本的權力網絡（如馮文中對互聯網拓撲結構、管理結構的描述），同時也成為行政權力延伸的重要途徑和目標。此外，這種新的控制技術必將為社會的行政、文化系統所管理和使用（如馮文中描述的「金盾工程」和「網絡警察」）。由此觀之，在一個「新聞自由」本身發展並不成熟的環境中，這兩方面結合導致的是傳統的對於信息傳播的控制理念，及其對應管理方式的維持，只是範圍更加擴大、控制力度更強了。這一切，顯然不是「知識份子的良知」所能撼動的。

近日，《南方都市報》刊發題為〈網絡警察『巡邏』BBS和博客〉的報導，國家權力和私人空間的界限又一次被模糊。政府職能的轉變在繼續，民主自由的理念在伸張，但集中的

權力主體、集權的控制理念，仍然是包括互聯網信息傳播在內的傳播控制體系的核心思想。我想，大陸現有的對於互聯網的控制結構並沒有在經濟發展的條件下成為危機性的存在，所以不能用一般的互聯網的技術突破性來反觀大陸控制體系的落後，只能在社會結構和文化本身尋找原因。

姬德強 北京

2006.7.3

事情還要更複雜

周永明的〈管治私有化與網絡信息接收語境〉（《二十一世紀》2006年6月號）一文認為目前的網絡管治有私有化傾向，並且存在着「信息傳送」與「接受語境」的落差。這一觀點基本是可信的。

不過，事情遠比我們想像的和已經表現出來的還要複雜得多。就像文中提到的記者那樣，不少人接受民主自由的理念並不等於就接受西方的意識形態「援助」和「施捨」，他們認為「中國是中國人的中國」，中國人自己可以「自為主客體」，自己管理自己，而不是被西方視作須要改造的「他者」。和

「知情的民族主義」不同，這是一種「有限度的民族主義」。當代中國的所謂精英階層就是這樣一個曖昧的群體。這種曖昧性一方面源於知識上的既得利益，另一方面也源於知識人本身對於未來的恐懼。這種曖昧性很難在短時間內改變，因為幾乎所有人都被淹沒在無處不在的「中國特色」中。

知識份子是如此，大眾對於所謂民主自由的「接受」又如何呢？近年來發生的多宗新聞事件——如孫志剛事件、寶馬案、超女、饅頭事件、韓白之戰以及最近發生的黃健翔「解說門」事件——都是通過網絡論壇、博客等渠道在第一時間得到傳播和爭鳴的。在這些爭鳴中，一部分被主流意識形態和媒體遮蔽的民意得到表達，公眾的公平、公正、公開的民主訴求得到傳播和宣泄，言論自由的精神得以彰顯。這些都是讓人感到欣慰的。但不容迴避的是，這些事件的原動力並非都源於對自由民主的訴求，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種被時尚裹挾的話語狂歡，有人把超女的短信評獎機制當作「娛樂民主」大肆鼓吹就是一例。無形之中，這種自慰式的娛樂民主成了政治民主的替代品。

有替代品總算「聊勝於無」。中國人對於技術的理解和運用從來都是實用主義的，網絡在中國億萬網民的生活中，自有其更加方便實用的邏輯。於是乎，網絡成為遊戲、聊天、網戀、追星、罵人、發泄「力比多」的最佳場所，構成人們虛擬的「幸福生活」的一部分。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自我和本我，天使與魔鬼攙和在一起，不分彼我。網絡匿名狀

態下的言論就像馬桶上的自由發泄一樣，最終不過是下水道裏的垃圾，而和真正的言論自由無關。不要忘了，這還只是一億多網民才可以享受到的自由，還有十多億不知網絡為何物的大眾呢？他們到哪裏去言說？周先生說：「人們所期待的網絡自由，只有在改變整個政治體制後才能實現。」這話從理論上似乎無可挑剔，可是返觀現實又難免讓人覺得太過浪漫。

留白 上海
2006.7.5

在被各方認可的「共同空間」中生存和發展

錢鋼在〈透過媒體語詞分析看中國新聞傳媒〉（《二十一世紀》6月號）一文中，對「輿論導向」、「輿論監督」、「新聞改革」、「新聞自由」四個關鍵詞作出計量分析後，得出的結論是：「權力和資本共同控制傳媒的嚴重問題，已現端倪。期待市場化改革會自然帶來新聞自由，是不切實際的想像。當金權合謀，完成『跑馬圈地』之後，中國新聞的改革將更加艱難。」

錢鋼的這一結論，使那些已為數不多的企望通過改革使中國新聞傳媒界獲取更多自由空間的人大失所望。事實上，不僅在新聞界，在經濟、政治、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等領域的改革，它們所走的軌迹大致與錢鋼對新聞傳媒研究所描繪出來的一樣：始於「開放」，阻於「八九」；小平「南巡」，再度興起；版圖巨變，「鐵律」亦舊；金權合謀，前景艱難。這種局面對於希望通過改革使中國變得更自由、民主

與平等的人來說，不免深感失望。

但是，如果不放棄信念，而且願意去努力實踐，那麼，把信念置於一個被各方所認可的「共同空間」中去生存和發展，無疑是一個值得肯定的選項。在新聞傳媒界，錢鋼認為「輿論監督」就是一個這樣的「共同空間」：「它是政府行政督察、投資傳媒的資本的牟利衝動，以及新聞專業主義三方共同的需要。」新聞自由的理念就可以在「輿論監督」這一「共同空間」中得到生存與操練。正是在輿論監督這一「共同空間」裏，追求新聞自由的新聞傳媒人士已做出了令人尊敬的成績：他們或把新聞自由的理念與輿論監督的價值結合起來，通過肯定輿論監督來爭取憲法賦予公民的新聞自由權利；或在監督的旗幟下，以極大的耐心一次又一次地「退半步，進一步」，一點點擴大「監督」空間，為公眾爭取權利，向大眾明真相，實踐着新聞自由的價值理念。

他們在「輿論監督」這一「共同空間」中實踐新聞自由的價值理念的努力不僅值得贊賞，同樣也值得借鑑。雖然現今金、權合謀所鑄造的制度幾乎「一統江湖」了，但是如同「輿論監督」這樣的「共同空間」在各領域都是存在的，只要「有志者」有心、有智慧，就能找到實踐自己理念的「共同空間」。一切可能不正是在積極的實踐中爭取到的嗎？

蔣賢斌 上海
2006.7.8